

敬业是人们专心致志、严肃恭敬、勤奋努力地对待本职工作的一种精神态度，也是社会对人们临事执业的一种道德要求。中华民族历来有“尽忠职守”“敬业乐群”的传统美德。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“事思敬”“执事敬”“敬事而信”，主张人要始终勤奋，为事业尽心尽力。朱熹明确指出“敬业”就是“专心致志，以事其业”，对待工作要认真负责，一心一意，精益求精，无私奉献。围绕着为何敬业、何为敬业，以及敬业的意义，先贤们提出了诸多论述，至今仍然给我们以启迪。

敬业： 敬事无圻 进德修业

李飞跃

此事此职，忠实于内心的感情，全身心地投入，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圆满。同时，事业的进步也会促使人生修为和境界的提升。

百事之成 必在敬之

敬事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，荀子早就指出：“凡百事之成也，必在敬之；其败也，必在慢之。”如果始终不渝地持敬事业，就可以达到无所不知、无所不通的神明境界，即“敬事无圻（不敢须臾不敬，不懈怠）”“则通于神明”。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无论做任何工作都要兢兢业业。孔子主张人要安分守己，“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”，反对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的无所事事、名不副实的消极怠工。如果一个人占据重要工作岗位却无所作为，就应该感到羞愧，故《礼记》说：“居其位，无其言，君子耻之；有其言，无其行，君子耻之。”工作态度和能力要与岗位相称，否则就会带来巨大危害，王符早就指出“德不称其任，其祸必酷；能不称其位，其殃必大”。

敬事敬业也是一个人品性的反映，《周易》说：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，所以进德也。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”如果充分意识到自己从事的职业对他人、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和义务，就会行事诚且敬，不敢怠慢。朱熹说：“凡人所以立身行己，应事接物，莫大乎诚敬。诚者何？不自欺、不妄之谓也。敬者何？不怠慢、不放荡之谓也。”立身行事，待人接物，要做到不自欺欺人，诚实忠信。只有忠实于



（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）



“业精于勤而荒于嬉”，人生最易荒废在游戏玩乐之中。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故事，史上不胜枚举。古人特别强调无论为学为官，都要勤勉尽责。“勤则职业修而事无雍塞”，要把“勤”作为首要的职业理念，只有“百职如是，各举其业；千官如是，各得其人”，才能事业兴旺，政通人和。诸葛亮正是这种勤政敬业的楷模，他在《将苑》中说：“军井未汲，将不言渴；军食未熟，将不言饥；军火未燃，将不言寒；军幕未施，将不言困。”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这不仅是他的为将之道，也是他仕宦一生的写照，用《出师表》里的话说就是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

敬业就要专心致志，持之以恒。荀子说：“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，慎终如始，终始如一。”朱熹也说：“敬者，主一无适之谓。”做一件事便专注于一件事，不能三心二意。梁启超认为敬业就是“凡做一件事，便忠于一件事，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，一点不旁骛”。《庄子》中曾记楚国有个驼背老人能用竿子很轻巧地粘蝉，就好像在地上拾取一

样。问其原因，则答道：“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而唯吾蝉翼之知；吾不反不侧，不以万物易蜩之翼，何为而不得！”凡做一件事，就要把这件事看作是自己的生命，无论其他什么好处，都不能牺牲现在做的事来与其交换。正是这种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”的精神，让佝偻丈人克服先天条件的不足，成为承蜩高手。

修己以敬 敬业乐群

“敬”不仅是一种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精神态度，还是人伦关系中谦恭有礼的行为规范以及为人的品德与修养。敬业与修身密切相关，因此孔子说要“修己以敬”，《礼记》也提出“敬业乐群”。孔颖达解释说：“敬业，谓艺业长者，敬而亲之；乐群，谓群居朋友善者，愿而乐之。”朱熹也说：“敬业者，专心致志，以事其业也；乐群者，乐于取益，以辅其仁也。”“敬业”就是要求人们对待职业心存敬畏，认真专注，勤奋努力；“乐群”则要求人们融入集体，彼此成为良师益友，互为裨益，共同进步。只有敬业才能基于事业而建立起亲近亲密的同事关系，树立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理想；只有乐群才能基于友爱而形成积极高效的工作氛围，促进事业的长远发展和兴旺发达。

乐业是身心的完全投入，是敬业的最高状态。老子说：“安其居，乐其业。”孔子也说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职业怀有一种恭敬愉悦的心情，因为“人不仅是为生活而劳动，也是为劳动而生活。劳动、做事就是生命的一部分”。把事业当作生命来看待，既是对事业的一种态度，也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。一旦为某种高远目标所吸引，人的心胸便因摆脱物欲纠缠而豁然广大。“敬”之状态使一己私念被抑制，从而使入进入一种超然世俗的生命体验。正如梁启超所说，“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”“因战胜而得快感”“把许多游思、妄想杜绝了，省却无限烦闷”，这便是“敬”而能“乐”的原因。

敬业、乐业，才能精业、兴业。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基本要求，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的体现，也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奉献精神。它看似平凡，实则伟大。

（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
□ 历史名人的家训

张英家训——治家之道 谨肃为要

郑清坡

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在教育子孙时，极其推崇张英的《聪训斋语》家训，并将其与圣祖康熙皇帝的《庭训格言》相提并论，称其“教育家极精”“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”。足见张英家训的价值，及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

张英(1637—1708)，安徽桐城人，康熙六年进士，曾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，为康熙朝政坛上之风云人物。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，后来位极人臣的儿子叫张廷玉，张家可谓权倾朝野。康熙曾评价张英“老成敬慎，始终不渝，有古大臣风”。

张英虽位高权重，却始终以“敬慎（恭敬谨慎）”处事。某日，张英穿朝服出门，却不知当天是一个忌日。此时，巷口有一人说到：今天是忌辰。他听到后急忙回家将朝服换掉，对这个提醒的陌生人心存感念。即便是在他晚年退居乡里时，也处处以居家老人与乡民来往，即使出行路遇担柴人也会主动让路。张英能做到如此谦让，与其为人处事一向谦虚谨慎密不可分。他以此为家训教导家人，在写给子孙的《聪训斋语》讲到“治家之道，谨肃（谨慎恭肃）为要”。他告诫子孙说，你们既然都享受了衣食富足无忧的福泽，就更应该做到敦厚谨谦、慎言守礼。这便是张英富有远见的地方。他深知“一家温饱，千家怨怒”，位高权重之家更容易受到各种责备、妒忌、怨尤、毁谤、讥刺等攻击，“有荣则必有辱，有得则必有失，有进则必有退，有亲则必有疏。”

如何做到谦虚谨慎？张英以古语“终身让路，不失尺寸”的道理教导子孙，也就是一生懂得谦让的人，最后并不会有什么损失。想要做到“忍让之道”，先须从小事做起，且与人相交“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于人”。他告诫子孙，一个人只要一言一行都想着有益于于人，而不是有损于人，人们就会望之如鸾凤，视之如珍贵的人参茯苓；必然会为天地所护佑，鬼神所折服，而享有更多的福分了。因此，只要能一直保持谦和谨伤的作风，人们自然会诚服，自己的名声也会逐渐响亮。

张英在《聪训斋语》家训中再三强调谦让有益无损的道理，并直斥世人所认为的对人谦让就会受人欺侮的言行是十分荒谬的。在他看来，自古只听说忍与让能够消除无穷的灾晦，却没有听闻忍与让会反招祸患。他深明“吃亏是福”的辩证哲学，“每思天下事，受得小气，则不至于受大气；吃得小亏，则不至于吃大亏。”凡事最不可想着占便宜，一个人把便宜全占了，则人们的怨恨也就集中于他身上；待把便宜丢掉，人们的怨恨也就随之消弭；“终身失便宜，乃终身得便宜也”“常持此心，深明此理，自然心平气和”。

张英的这些家训在后世子孙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其子张廷玉便在给儿孙的家训中自述对《聪训斋语》家训“终身诵之”，并在为官处事中进一步发扬了谦虚谨慎的作风。

雍正十一年，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霁参加科举考试，举行廷试后，考卷进呈雍正皇帝，被钦点为一甲探花。待拆卷后，雍正才知他是张廷玉之子，遂遣内侍传谕张廷玉，告知其子得中探花。张廷玉随即觐见皇帝，表示他家“世受皇恩，无所不极”，对其子取中探花坚辞不受，并请将此功名让于天下寒士。雍正深感其义，遂将张若霁改为二甲一名，并宣谕对张家父子大加赞誉，以表彰其“谦逊之诚”。上谕中对张英子孙三代充斥赞誉之辞，称张英为官数十年，清忠和厚，始终不渝；对张廷玉则以上古虞舜时期的名臣皋陶、夔相期许；并赞许张若霁秉承家教，能有这样的成就不仅是张家的喜事，也是国家的喜事。这显然对张家谦虚谨慎的家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

张英家族深受康熙乾隆三位皇帝的青睐，素有“父子双宰相”“三世得谥”“六代翰林”等赞誉，这与张英“治家之道，谨肃为要”的家训不无关系。后人曾谓“张氏当隆盛时，其子弟无不谨教谦约，可为大臣家法”。曾国藩亦将张英的家训寄予侄子曾纪渠，并赞许侄子“恭敬谦和，德性大进”。这也算是张氏家风的深远影响。

（作者系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）



□ 汉字故事

解密孔府大门楹联

杨立新

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大门旁，有一副天下闻名的楹联，此联传为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所书。上联为：“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”，下联为：“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”。该联书联俱佳，与孔府大门正上方的一块蓝底金字的“圣府”匾额交相辉映，堪称孔府一宝。



曲阜孔府大门楹联

然而，这副楹联的上下两联中，各有一字与我们现行的规范汉字书写不同：上联的“富”字少了一点，写成了“冨”；下联的“章”字，最后一竖破日而出。同时两字都不是繁体字，故而很多人认为是错别字。



少点的“富” 出头的“章”

然而，堂堂的“河间才子”、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纪晓岚会写错字吗？更何况还是挂在“天下第一家”衍圣公府的门柱上。于是便有人认为这是纪晓岚有意写错字。为什么写错呢？因为其中暗藏玄机。

他们是这样解读的：上联“富”字的宝盖头少一点，叫做“富贵无顶”；下联“章”字一竖破日而出，叫做“文章通天”。并将二字冠以“最有文化的错别字”。

居然还有人编出这样的故事加以戏说。称孔府这

两个“错字”是神来之笔，系仙人指点。相传在孔子第42代孙孔光嗣成亲那一天，恰有神仙路过，看到孔府门前影壁上的“富”字，便把“富”字上的一点抹去了。孔家怪之，神仙道出了玄机：孔家不宜过富，要“去一点”。

于是，这种说法便像留声机一样在导游嘴里被反复播放，一些游客深以为然，口口相传，更扩大了这一错误说法的社会影响面。

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解读是否符合儒家的礼乐教化，是否有损于孔子“德侔天地、道冠古今”的圣人风范，仅就文字本身而言，就是强不知以为知，见了骆驼就说马背肿！

其实在古代，“富”字和



《宋四家书法字典》中的“富”字

“章”字这两种写法都是规范性书写，它们都作为两字的俗字或通字被广泛使用着，只是后来在汉字简化过程中被淘汰了而已。

我们先看不加点的“富”字。此字在唐代颜元孙《干禄字书》中即有收录，指明为正体“富”的俗字。但在实际书写中，这种俗体写法却颇受古人青睐。为了进行量化比较，本人摄取了《宋四家书法字典》中的“富”字，可以看出，在15个“富”字中，不加点的为8个，加点的为7个，不加点的多于加点的。

我们再看出头的“章”字。在古代碑帖中，此种写法广泛出现在隶、楷、行诸体中。《干禄字书》也录有该字，注明为正体“章”的通字。如下面这些出头的“章”字，均出自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些著名碑帖——



正所谓“古人未必然，而今人未必不可”，今天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的时候，常常会犯这种以今度古、以己度人的错误。在孔府、孔庙、孔林中，这种所谓古人写错别字的说法还有很多，一些导游添油加醋，信口胡说。事实上，由于历代统治者关注祭孔活动，“三孔”的楹联、匾额书写极为严格和规范，其书写者均为当时的博学鸿儒，一些匾额、楹联还被全国各地的文庙所仿制，故不可能出现错别字或随意性书写。